

人文讲演录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
——人文讲演录

责任编辑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厂 址 电话

开 本 880×1260 毫米 1/32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8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2347-9/G·2098

定 价 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303538 3300420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目 录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1
——费孝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解构与全球化	12
——雅克·德里达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	
□让昨天与明天相遇在今天	25
——张信刚 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纵横文化五千年——漫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45
——吴小如 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	63
——许渊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100
——陈乐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114
——易中天 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	131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	
□移民与中国	144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谈中学与西学	169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186
——万俊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中国文化观念中的“真”	204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全球伦理与黄铜时代——谈谈金律、银律、铜律、铁律	230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	249
——郭齐勇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康德的宗教伦理给我们的启示	266
——邓晓芒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为美学补“爱心”：从王国维“接着讲”——理解生命美学的一种方式	288
——潘知常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教授	
□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308
——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文学经典的症候式分析	327
——兰棣之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唐宋诗词的现代解读	338
——莫砺锋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与中国现代文学	361
——王文英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入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374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心理学现状与发展前景	385
——张厚粲 国际心理学联盟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大陆贫富差距问题及对策	403
——李 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	427
——梁从诫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自然之友”会长	
□附庸风雅与艺术欣赏	444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谈自学	470
——钱钟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名誉校长	
□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学习与创新	490
——王义遒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现代人的阅读困境	499
——余秋雨 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教授	
□数字电影新时代	519
——郑洞天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教授	
□聊聊京剧	542
——吴 江 中国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生命中追寻的爱	555
——刘 墉 台湾著名作家	
□后记	587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费孝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百年前创立这个高等学府,在历史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因为这正好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在这地区的初步成功,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了破冰作用,是十分重要而值得纪念的。我认为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是科举制度的废止和学校这个新制度的获得建立。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亲为这场改革所作的努力。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他接受了地方政府的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本乡开办了个县级中学,我母亲也是本乡幼儿园的创办人,当时称蒙养院。这些在当时都被称为“洋学堂”,是新生事物。这是我上一代的功绩,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基础。

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而且基本上一直传到现在,富有它的生命力。我受到的教育就是从当时的新学校制度开始的,我经常向人自骄地称自己是完整地从小制度里培养出来的人。我在新制度下所受的教育是从西方国家经过日本传入的,它使我这一代从童年起就能接受学校教育,参加同代人的集体生活。这和私塾是不同的,而且受的教育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别于传统的私塾教育。我们不再强迫背书,而且不再用旧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等作为启蒙的必修教本。我记得在初小时第一本国文教科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现在活着的人中用这个课本开始学习语文的大概已为数不多了,但这件历史上的小事

却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今天我提到这件小事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的文化需要改革和发展是人类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在一百年前已酝酿了相当长的时期。从清代的戊戌政变起始,维新的运动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冒了头。维新运动是由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想以日本为榜样,引进西方文化,起初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门引进西方文化。但这座门一开,西方文化就势如破竹地冲破了东方文化所设置的重重阻碍,到了民国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有人明目张胆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了。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闭关自守,到这时再也守不住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浪潮,拜德、赛两先生为师,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变动在历史上的主要方向,也是不容我们否定的历史事实。当前提出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这个历史潮流的继续。

当然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大势下,也时时出现折中派和反对派。折中派是对西方文明要求有选择地引进,反对派则认为西方文明走到了尽头,今后应是东方文明领先。“今日河西,明日河东”的轮转循环,一唱一反原是思想平台上的常规,但时至今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我们的确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东方文化的前途了。

对我自己来说,从三十年代投身到学术领域里,进入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文化的动向本来应当是研究的一个主题。具体地说,不能不关心自己传统文化的前途,但这个问题却是个深奥难测的谜团。以我个人受到的教育而言,具有着重引进西方文化的家学传统,已如上述。三十年代开始我就立志追随老师吴文藻先生,以引进人类学方法来创建中国的社会学为职志,详言之即用西方学术中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来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学。这个目标显然是从西方的近代人类学里学来的,它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实际上

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在学术上的表现,科学理论必须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事物为基础的。这个学派的特点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生物性个人的重视。所谓文化的概念,说到底“人为、为人”四个字。“人为”是说文化是人所创制的,即所谓人文世界,它是为人服务的设施。这确是反映了自然——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衣食住行的整个生活体系都依靠人力改造的自然世界而得来的人文世界。这一点事实是大家能明白和切身体会得到的。我们现代的生活,甚至和自然世界接触的人体感觉器官都经人为的媒介改造过的。肉眼上要罩上眼镜,进一步还要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一类的器械,单凭肉眼已经不易与自然界亲密地全面接触了,听觉上也是如此,我们依靠助听器、电话等设备来听取我们所接触到和辨别到远距离传来的声波。这种生活的现实,使我们习惯于把自然看成是我们生活的资源。一方面是生活越来越复杂和广阔,一方面我们把自然作为为我们所利用的客体,于是把文化看成了“为人”而设施了;“征服自然”也就被视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这样我们便把个人和自然对立起来了;“物尽其用”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

我们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种基本上物我对立的意识也越来越浓。在这种倾向下,我们的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改造自然世界的成就,这样不但把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相对立,而且把生物的人也和自然界对立了起来。这里的“人”又被现代西方文化解释为“个人”,因之迄今为止个人主义还是西方文化的铁打基石。西方文化里的个人主义加上人通过自己创出的文化,取得日益进步的现代生活内容。于是不仅把人和自然对立了起来,也把文化和自然对立了起来。这也许是西方文化当前发展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西方的学术领域里也显著地表明了这个特色。首先是以认识自然为职志的学术领域里也被自然科学所占据

了。把研究同样应当属于自然界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压缩在次要的地位。

二

总而言之,在西方文化里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把人和自然对立了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这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以至有一种倾向把文化看成是人利用自然来达到自身目的的成就。这种文化价值观把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视作人的奋斗目标,把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放在其对人生活的功利上,文化成为人用来达到人生活目的的器具。器具是为人所用的,它的存在决定于是否有利于人的。这是现代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

当然在西方现代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是肯定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从较低级的动物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动物。但这种基本科学知识却被人与人之间利己主义所压制了,在进化论中强调了物竞天择的一方面,也就强调了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由此而出现的功利主义更把人和自然对立了起来。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成了科学的目的。因此对自然的物质方面的研究几乎掩盖了西方的科学领地。甚至后起的对人的研究也着重于体质方面,研究人心理的科学也着重在人体中神经系统的活动,即所谓行为科学,可见西方科学发展史上深深地受到其文化价值观的制约。

我最近为了补课,重又复习了上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学的历史。我从派克老师早年的著作中体会到他对当时欧美社会学忽视人们的精神部分深为忧虑。科学原本应当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为研究对象,但是在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只承认看得到、听得到的现象为研究范围,而人的生活中却有很重要的内心活动是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因而社

会学被困住以至不容易建立“科学的社会学”。

我这样说,是指西方科学界整体而言的,其中也有许多对此不满意的学者,而且我所师从的几位老师都属于这一类。比如我在清华大学所师从的史禄国教授,他苦心孤诣地要插手研究人类精神方面的文化。他在西方传统词汇里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词,结果提出了一般人不易理解的 Psycho-mental 这个新名词,而用此作为他最后的巨著的书名,即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anguis。我猜测他创造这个新名词,反映出在他一代人中人的研究工作一般还是不愿意把精神实质的文化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再说一段我个人的经历,史禄国老师在我踏进人类学这门学科时,为我预定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学体质人类学;第二是学语言学;第三才是学当时所通行的文化人类学。我当时对他为我规定的学习顺序并没体会到这三步正指出了对人的研究的三个层次:从人的生物基础出发,进一步研究人和人相互传递共识以获得共同活动的语言,用我现在的体会来说,正相当于派克老师所说的科学的社会学;然后进入到现有世界上多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上所说的是我老来的私人体会,我把这个体会放在这里来讲,是要说忽视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完全改变的对文化认识上的失误。这个失误正暴露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相对立的基本思想的文化背景。这是“天人对立”世界观的基础。

在这里还应当指出,上面所说“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中的“人”字还应当加以说明,这里的“人”字实在是西方文化中所强调的利己主义中的“己”字,这个“己”字不等于生物人,更不等于社会人,是一个一切为它服务的“个人”。在我的理解中,这个“己”正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要看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也许理解这个核心是很重要的,东方的传统文化里“己”是应当“克”的,即应当压抑的对象;“克己”才能“复

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

三

我在前面提到我过去常用“人为、为人”四个字来说明文化的本质是不够全面和确切的。因之对这四个字中的“人”字还应当多说几句。我一直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中所认定的人是从较低级动物演化来的观点，我的一位老师潘光旦先生已经把达尔文的名著《人的由来》翻译成了中文，我接受这书中所做的科学结论。但是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高等动物不但从原始生物的基础上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在演化的历程中获得了其他生物类别所没有的特质。这些特质固然也是从较低级的生物中逐渐演化得来的，但凭这些特质的继续发展演化，取得了其他物种达不到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由于人的神经系统的发展，除了能够接受外界的刺激，以获得意识上的印象之外，还能通过印象的继续保留而成为记忆，而且还能把前后获得的印象串联成为认识外界事物的概念。不仅如此，还发展成为有一定内容即意义的音像符号(Symbols)，于是产生了语言和文字。凭着这些有一定意义内涵的语文，即这些具有社会共识的符号，由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因之得以相通。这是这一个个人和其他人取得结合的关键，并导致他们可以发生分工和合作，完成共同的目的，达到共同的理想。这就是派克老师所指的社会实体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生物人”和“社会人”等名词来区别由生物进化完成的生物人和由生物人的集合成群体而成为的社会人。一丝不挂的独自为生的生物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而西方文化中把它偏偏作为功利主义中的“己”，突出来和自然相对立。这个虚拟的“己”，是事实上无法独立生存的生物人。

生物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它的生命实际上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谓有生必有死,生和死两端之间是他的生命期。由于生物人聚群而居,在群体中凭其共识他们相互利用和模仿别人的生活手段以维持他的生命。这时他已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物人的生命得以绵延直至其死亡。每个生物人都在生命中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说的人的生活是指社会人而言的。生活维持生命的继续,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的必经的过程,但是生活却是从生物机体遗传下来的机能通过向别人学习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哺乳到死亡的一切行动,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这一切统统包括在我所说的人文世界之内,它们是具体的文化内容。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这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获得生活,也可说一离开母体即开始从生物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社会人共同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创新的成分都是社会任凭其个人天生的资质而日积月累并在与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一旦为群体所接受,人文世界的内涵就不再属于任何个体了,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文化社会性。文化是人为的,但这里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创阶段,它是依靠被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一群社会人相互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或说包括它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因而群体中个别生物人的死亡并不跟着一定发生文化零部件的存亡,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

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生死的定律,而有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

请允许我不免有点重复地再对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说几句。这里必须强调社会人靠群体而存在,群体是由生物人聚集而形成的,生物人聚成了群体,构成了社会,才发生社会人。从个别来看,生物人的生死也是社会人的生死,没有生物人,社会人也就没有了载体,但是从群体来看,生物人的生死是前后差序不齐的,这就是我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生物人所创造的文化(文化之内包括群体的社会组织 and 制度),都可以持续往下代传递。除非整个群体同时死亡,文化在群体中是可以持续传下去的。还应当说文化包括它物化的器材和设备,可以不因人亡而毁灭。过一段时间,即使群体已灭亡了,如果有些遗留下来的物化的文化还有被再认识的机会,它还是可以复活的。所以文化的自身里有它超越时间的历史性,文化生命可以离开作为它的载体的人(包括生物人和社会人)而持续和复兴。这是文化的历史特性,因此我们有“考古学”这门学科。

四

强调重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文化的价值观。我在上面讲到了我认为西方文化里,从大多数民众来说,存在着严重的以利己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从已往的历史来看,二百多年来曾为西方文化取得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的事业里立过功。但是到了目前,我担心它已走上了转折点,就是由于形成了人和自然对立的基本观点,已经引起了自然的反抗,明显的是当前

人们已感到的环境受到的污染确是带来了人们生活的困难。大处和远处且不提,即以最近在我国北方出现恼人的沙尘暴,确是我活到九十多岁后才开始受到的这切身经历中最恶劣的天气。这可说只是自然在对我们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的一桩很小的反抗的例子。讲得大一点就是人类已经有所觉悟而且对此作出的保护环境的绿色革命。但是可悲的是连最近提出的这类世界性的保护环境的公约没有能得到国际上的一致支持。

“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人们都惊觉了,这在我看来是个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我在电视机前看完这场惨剧的经过后,心里想,西方国家特别是受难国一定会追寻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问一问这是不是西方文化发生了问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私自的反应。但是我的私愿落空了,事件发生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我对一般的“以牙还牙”报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人类甚至动物的原始性的心理反应。但是接着却把事件当作刑事案件来对待,缉拿凶手成了主要对策。凶手找不到就泄愤于被指为嫌疑对象的所在国,进行了不对等的战争,并利用现代科学所创造的武器对嫌疑犯所在的国家进行狂炸滥轰,以反对恐怖主义的正义名义进行的这场战争造成了大批无辜人民的死亡和遭殃。在我看来这是以恐怖手段反对恐怖主义的一个很明白的例子,是不是应了我们中国力戒“以暴易暴”的古训?这是我这信息不灵通的老人的私见,但也许可以联系上我在前面所讲的西方文化的“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来看这段历史,而觉得西方文化的价值里轻视文化的精神领域,不以科学态度去处理文化关系,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我想接下去继续在对文化的思考上说几句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之处的问题。我着重说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这

正是东西方区别的要害处。我私人认为西方文化强调的人利用自然而产生促进技术发展的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同时也正反衬出东方文化着重“天人合一”的传统。这里的“天”字应作为“自然”解。我一开头就介绍我的学历是个从小在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以缺少了一段中国传统的经典教育,但是在业余时间我还是受到了上一代学者关于国学研究的影响,而且在学校里上学时已听到过“天人合一”的说法,虽然当时并没触及我的思想深处。直到最近这几年,九十岁以后,我补阅了我故乡邻县无锡出生的钱穆(宾四)先生的著作。他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论的历史学者,据说在他快要弃世之前不久曾对他的夫人说,他对“天人合一”有了新的体会,而且颇有恍然大悟之感,但所悟的内容却没有机会写成文字留给我们这些后代。正是记起了这件事,使我也注意到文化价值观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当前西方文化中突出的功利追求和着重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根源,也许从根本上看就在这“天人对立”的宇宙观。我在这里不由得不能又想起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么一思考也使我有一点豁然贯通的感觉,中华文化的传统里一直推重《易经》这部经典著作,而《易经》主要就是讲阴阳相合而成统一的太极。太极就是我们近世所说的宇宙,二合为一是个基本公式。“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宇宙观的一种说法。中华文化总的来说是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的,大一统的概念就是这“天人合一”的一种表达。我们一向反对“天人对立”,反对无止境地用功利主义态度片面地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的需要,而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这种基本的处世的态度正是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位育”的观点;“位育”就是“中庸之道”,对立面的统一靠拢,便使一分为二成为二合为一,以达到一而二、二而一的阴阳合而成太极的古训。

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是有分歧的,目前在经济上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这一阶段大家关心的是多元化文化不要互相冲撞而同归于尽,这应当是“九·一一”事件给我们的警告。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怎样取得人类持续发展的机会,必须尽力接受“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所提出的警告,避免同归于尽的前途。我在这个局面中想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处境,敲敲警钟以保卫世界和平,祝愿我们当前还存在着差别的多元文化能在各自的发展中走向能和平共处的世界。并愿在祝贺我故乡的高等学府成立百周年纪念的时刻作出这个呼吁。同时也想表白我坚信我们东方文化能在这个矛盾中作出化凶为吉的大事,作出对历史的贡献。言有未尽,意有未达,而且究系暮年之见,难免有偏执之处,请多多见谅。谢谢。

解构与全球化

雅克·德里达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

世界著名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先生于2001年9月9日至11日来南京大学访问。在宁期间,与南京大学部分师生就解构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主持人: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现代文学理论史、哲学史或美学史,都会看到德里达以及用解构命名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史定位,不夸张地说,这甚至会是一个断代的象征。昨天德里达先生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这使得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关于解构理论的后现代诠释中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断裂。今天,德里达先生将在这里给我们做题为“解构与全球化”的学术报告并进行讨论。这也算一次“解构理论”意义分延的亲自“在场”。让我们欢迎德里达先生!

德里达:感谢诸位来宾。我想对大家说我是多么的幸福与荣耀。既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世界化、全球化,那我就从语言问题说起。从世界范围来看,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语言问题。我想,在当前世界化进程中,如果我们要抵制第三种语言的霸权,如果我们要抵制标志社会发展的语言霸权,比如美式英语,那么就要有更多的法国人学中文,更多的中国人学法文。我更希望倾听和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我只作一个简短的、概括的引言。我尤其想说的是,看到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那么多年轻的小伙子、姑娘,我是多么的高兴。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鼓舞的信号。你们是最古老的人民,最古老的民族,但我要说的是基于你们的未来,你们有责任预备着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人民。